

浙藏善本叢書

四書遇

〔清〕張
俗著



6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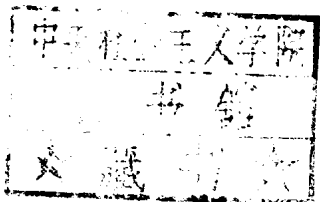
〔清〕張岱著

浙藏善本叢書

DG02 / 56

四書

遇



浙江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孫家遂
封面設計 倪集裘

四 書 遇

〔清〕張岱著

朱宏達點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號)

浙江新華印刷廠印刷
(杭州環城北路天水橋堍)

浙江省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21.25 插頁4 字數300,000 印數1—8,6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1347·13 定價：4.50圓

四書遇

大學

聖經章

山陰張

岱纂

艾千子曰對小學而言謂之大學今人以大學屬之
成均辟雍謂天子之學不與庶方小侯同者此是大
學止一學宮之名耳然則改其文曰成均辟雍之道
在則德可乎後學慎之

韓求仲云

有親有義如云因其自然之意此間不

人知免以天下

為之以天下與

重此時洪亮初闢人亦未必盡開等竅聖人揭之使

未天下君天下

有可

之天下也免以天

下復君以不

馮開之曰以天下與人易二句劉縉雲說與人直是

委託之意此二句猶言付托天下不難付托得人為

難此說絕佳

惠忠二字吾不欲說壞蓋此亦是所得之一人一事

也此意天下不

居則不能見也

稷契足以當之合之總成堯舜之仁者耳

壽王白嶽公

雄岳勇不位

卿

曾聞常雄重顧仙畫是文人抱慧業紫陽溪水

翰墨看晚年得證長生訣方晚還丹在典墳白

嶽先生恐襲襲先生持世公十年自識之無至

臺臺日夜錯研故紙堆筆冢書倉為窟穴座前

足跡砌皆穿簷際微明捧卷接金臺呵凍齒冰

霜揮汗鈔書沐日月廣蒐直欲逐麻龍博採有

明人說經大似禪家舉公案
張宗子亦同此血脈卷中時
習舊語雖未必得旨亦自
可喜豫於破義也難味同
嗜端者遠矣 易字



出版說明

一、本書正文據浙江省圖書館甲級特藏抄稿本《四書遇》整理。凡原抄本中張岱親筆所作眉批、補記及浮箋，統列各章正文之後，於校記中說明。

二、原抄本不附「四書」原文，爲便讀者，今據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將原文分別附在各章正文之後。《集注》有某一章，而原抄本闕失此章正文者，標明闕失，此章仍照錄不刪。正文分章、序次偶有與《集注》不同者，均從《集注》，於校記中說明。

三、原抄本共六冊，不分卷，無句逗，今爲加新式標點。惟因本書徵引廣博，又未嚴格抄用原文，故正文引語，除已核對者外，只加冒號，不用引號。

四、正文引語凡出自經史諸子及北宋以前名家著作者，多已核對原書，於校記中注明書名、篇名或卷數，時或摘錄其文，列在「四書」原文之後。

五、本書以繁體漢字排印。凡原抄本中使用之異體字，如：「恠」（怪）、「辜」（罪）、「咲」（笑）等，俗體字，如：「賢」（賢）、「惡」（惡）、「據」（據）等，一律改爲正體。至如：「正」作「政」、「由」作「繇」、「實」作「寔」等，本可通用，則一仍其舊。遇有明顯錯字、脫字，逕予改正補足，擇要於校記中說明。

六、本書附錄（一）《壽王白嶽八十》七言古詩一首，原夾附抄本末頁，雖內容與本書無關，因出張岱親筆，今仍照錄，以存原貌。附錄（二）「人名索引」以筆畫筆順爲序排列。只列正文引語作者，不列引文提及人名。

四書遇題記

明人說經，大似禪家舉公案，張宗子亦同此血脈。卷中時有雋語，雖未必得旨，亦自可喜；勝於碎義逃難、味同嚼蠟者遠矣。

馬 浮

前言

據浙江省圖書館特藏抄稿本刊印問世的《四書遇》，是明末清初著名散文家張岱的一部語錄體讀經著作。

張岱（一五九七——一六八五？）字宗子，改字石公，號陶庵，又號蝶庵。浙江山陰（今紹興）人。他出身在一個由巴蜀遷來江南的世宦之家。高祖天復是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曾任雲南臬司副使。曾祖父張元忬受業王畿，是陽明學派的思想家，隆慶五年進士第一人，官至翰林院侍讀、詹事府左諭德。祖父張汝霖是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進士，曾任廣西參議。父親張耀芳晚年任山東兗州魯王府的右長史，是魯獻王的親信。張岱就是憑着家世的通顯和富裕，在前半生過着纨绔子弟的豪華生活。同時，他又十分愛好讀書吟詩，乃至包括練習八股文和試帖詩。用張岱自己的話來說：一方面好美婢，好嬖童，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烟火，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自為墓志銘》）；一方面又好學業，好古作，好遊覽，好詩詞，好書畫，好作史，好參禪（《祭周穀伯文》）。稱得上是張羅於百般遊藝，舉網於無涯星海，乃至有道必問，無藝不精了。

明亡以後，張岱披髮入山，避居剡溪，生活發生根本的變化，「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其時，他已年近半百，漸入老境，但仍能以明代愛國遺民的身分矢志勵節在窮困中堅持著述，直至老死。

張岱一生，著述弘富。據其《自為墓志銘》所載共有十五種。晚年又撰有《越中三不朽圖贊》等數種。其中文集如《琅嬛文集》，史學論著如《石匱書後集》，散文小品集如《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已先後

問世，有的並爲世人所熟知。但張岱的某些著作如《義烈傳》、《夜航船》、《快園道古》等，則沉 三百餘年，未有印本，人們但知其目，未得一睹其書。《四書遇》也是其中未刊的一種。日本學者松枝茂夫〔注一〕在《讀張岱〈陶庵夢憶〉》的長篇論文中說：張岱的著作「大半已經亡佚，無由得見了」，深致其遺憾之情，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張岱既能以清新流麗和富有詩意的筆觸描叙出昔日三吳都會的人情風土，名物掌故，又能以「不隱惡，不揚善」的嚴肅態度和傳統史筆，寫出明史巨著《石匱書》。他寫《石匱書》，歷經明清之交，前後有四十年之久（《與李硯翁》）。同時，他又以差不多同樣長的時間堅持撰寫讀「四書」心得，終於完成了一部首尾完整的經學著作《四書遇》。張岱一生的心血和成就，就凝聚和包含着如此不同的幾個方面，表明他確是明清之際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家。

《四書遇》係抄稿本，是浙江省圖書館於一九三四年購得。原藏寓杭常熟周氏鶴峰草堂。首頁有「虞山周左季鶴峰草堂藏書印」記，長方白文。下孟卷首有「周大輔（註二）」白文方記，「曾經鶴峰草堂周氏所得」朱文方記。一九三六年浙江文獻展覽會曾將此書展覽。或稱此書係「鄉賢手澤，三百年來輾轉遷流，完好無恙，不至如《史闕》之難免劫灰，而顛倒錯亂，有賴後人之爬梳整緝者，爲尤可珍矣。」（《浙江圖書館刊》三卷第六期《館藏善本書提識十》）

《四書遇》題張岱纂，總六冊，不分卷。原書僅撰作者心得札記，不附錄「四書原文。次序」按《大學》、《中庸》、《論語》（分上論下論）、《孟子》（分上孟下孟）排列。全書以讀《論語》心得爲最多，篇幅最長，共三冊。餘則爲讀《孟子》心得二冊，讀《大學》、《中庸》心得合一冊。書係白棉紙藍格，端楷謄抄，并有張岱

親筆書寫的眉批、增刪和另加浮箋共約十數處。其中浮箋三紙，即《論語·爲政·能養章》「孔子論孝」條；《論語·八佾·器小章》「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條；《論語·公冶長·子路章》「古人惟安車乃坐」條。親筆增易二條，即《論語·鄉黨·厩焚章》「金甌子言厩焚」條；《論語·微子·逸民章》「虞仲次夷齊後」條。由上述正楷謄抄及張岱親筆增易等情來看，抄稿本《四書遇》是一部清抄本，已經張岱審訂增改，最後覆核，只是來不及付梓印行罷了。

《四書遇》其書並不見諸前人著錄，清初黃虞稷撰寫的考查明代典籍的重要目錄《千頃堂書目》和《明史·藝文志》及以後的《四庫全書總目》均無記載。雖然，《四書遇》確係張岱所著則無可疑。因爲：

①張岱《自爲墓志銘》中說自己平生「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匱書》、《張氏家譜》、《義烈傳》、《瑯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闕》、《四書遇》、《夢憶》、《說鈴》、《昌谷解》、《快園道古》、《俠囊十集》、《西湖夢尋》、《一卷冰雪文》行世。」可見，在他自己所開列的書目中，是分明寫着《四書遇》這一著作的。

②《四書遇》抄稿本無序跋，但《瑯嬛文集》中有《四書遇序》一篇，稱：「余幼遵大父教，不讀朱註。凡看經書，未嘗敢以各家注疏橫據胸中，正襟危坐，朗誦白文數十餘過，其意義忽然有省，間有不能強解者，無意無義，貯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讀他書，或聽人議論，或見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觸目驚心，忽與此書有悟，取而出之，名曰《四書遇》。」這裏叙其著述主旨及經過甚詳，與抄稿本《四書遇》內容也完全相符。另有《與祁文載》一篇（收入《瑯嬛文集》）稱：「余解《四書》《五經》，未嘗敢以注疏講章先立成見，必正襟危坐，將白文朗誦數十餘過，其意義忽然有省……故人能熟讀經文，深思義味，莊子所謂「思之思之，神鬼通之」，政謂此也。諸解具在，皆弟於朗誦白文，忽然有得，第恐錯入魔境，希望明眼人爲弟指迷。願禱，願禱！」所述情況與上引諸文一致，且這裏說的「諸解」可能就是已經完篇的《四書遇》。

③近代著名學者，張岱的同鄉馬一浮先生在抄稿本《四書遇》的扉頁上，有親筆題記一篇，稱：「明人說經，大似禪家舉公案，張宗子亦同此血脈。卷中時有雋語，雖未必得旨，亦自可喜，勝於碎義逃難、味同嚼蠟者遠矣。」馬一浮不但認定張岱是抄稿本《四書遇》的作者，而且對該書作出了自己的評價。

張岱在《四書遇》序中說：他讀「四書」，決不因襲前人注腳，強調在電光石火般的一閃中間悟出某種妙解，隨有所得，即有所記，而《四書遇》又是語錄體著作，所以《四書遇》決非一時一地之作。至其起訖之年代，可以從下引兩條材料中約略推知：

其一，「刺虎不斃，斷蛇不死，其傷人愈多。君子之遇小人政不可不慎。近日楊、左之御魏璫是其鑒也。」《四書遇》論語：泰伯·好由章。這裏的「楊、左」指東林黨人楊廷、左光斗。「魏璫」指魏忠賢。據《明史紀事本末》熹宗天啓四年（一六二四）楊、左等人彈劾魏忠賢二十四罪。「先是疏成，意欲於午朝面奏，出疾雷掩耳之計。繕寫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則機洩且害也，遂循例封進，故忠賢得以彌縫。」從第二年，即天啓五年（一六二五）秋七月開始，魏闖興大獄，把楊、左等人投入監獄，施以酷刑，竟至慘死。其時，張岱約當而立之年，是所目睹親聞者。「近日」二字說明，《四書遇》開始寫作的上限最遲在明天啓年間，張岱三十歲之前。

其二，「余遭亂世，見夷狄之有君，較之中華更甚，芟夷宗黨，誅戮功臣，十停去九，而寂不敢動。如吾明建文之稍虐宗藩而靖難兵起，有愧於夷狄多矣。」這裏的「亂世」，是指清兵入關後對中國的統治。「夷狄」是對清政府的貶稱。明建文元年（一三九九）惠帝削藩不成而靖難兵起，已是歷史的陳迹。而清政府芟削宗藩務求盡去，却是張岱親見體驗的事實，并不如孔子所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由此可以推知《四書遇》的寫作一直延至明亡入清以後。然《四書遇》序云：「余遭亂離兩載，東奔

西走，身無長物，丟棄無餘，獨於此書，收之篋底，不遺隻字。」據此記載看來，《四書遇》在甲申明亡之前已經基本定稿，入清以後或有增補。其結集下限最遲不得超過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張岱六十九歲自爲墓志銘之前。

總之，《四書遇》是張岱以全副精神而爲之一部著作。自四部七略乃至宋明時人關於儒道釋薈粹瑣屑之論，無不旁證博引。僅引用語錄所涉及到的人物，就有二百六十七人之多。張岱之苦心孤詣於此書亦可見其一斑了。且同一人物前後稱呼又頗有異同，如引蘇軾語就有蘇子、蘇長公、坡公、東坡、子瞻六種不同稱呼，此雖屬末節細微，然亦可佐證《四書遇》寫作時間前後延續之久。

《四書遇》全書對宋儒程朱以及他們創立的理論體係，有所非議，有所批判，或校定句讀，或詮釋字句，或調整章次，或訂正學脈，計有三十多條。這對於封建社會中後期被奉爲正宗的理學權威著作《四書集注》，無疑是個不小的沖擊，表現出張岱能擺脫某些傳統思想束縛和他對程朱理學的蔑視。

然而，張岱批判程朱的武器和理論根據，仍不免是明末思想界十分流行的陸王心學。例如《中庸·無息章》：「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朱注：「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張岱批駁說：「博厚六字是功，不可云同體，聖人與天地同體在至誠，不在博厚、高明、悠久。」就是說只要具備至誠之心，就可與天地同體。這和王陽明「心是宇宙的本體」，陸象山「宇宙就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幾乎是一脈相承的。張岱明確說過：「總見心學不可少有間斷，孟子拔茅和孟母斷機是一般教法。」（《四書遇》）《孟子·盡心·山徑章》：「拔茅」原是孟子對高子的批評：「今茅塞子之心矣。」斷機「本來是孟母以客觀具體事物喻學習之不可中斷。張岱將兩者合爲一談，把認識主體的自我（心），凌駕於被當作喻體的客觀事物之上，附

會心學，顯然是主觀至上的唯心主義，它可以說是貫串《四書遇》全書的核心。

陸象山認為只要向內探索認識本心，就可了解宇宙萬物，客觀事物不待外求。王陽明主張「心外無物」。張岱同樣認為：「聖人論人，必論其心。」（《四書遇》《論語·述而·衛君章》）「故學者不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四書遇》《孟子·盡心上·孤孽章》）「認得本心，一生更無餘事。」（《四書遇》《孟子·盡心上·如此章》）引張侗初語：「心體中打迭得乾淨，聖賢學問自一了百當。」（《四書遇》《孟子·盡心上·如此章》）引張汝霖語：「這一類『本心』高於一切，決定一切的觀點，自然是『心爲本體』論。這顯然是對程朱理學的批判，是以主觀唯心論批判客觀唯心論，兩者似乎沒有本質的區別，但這是傳統的主張向內凝聚的方法論的繼續，在封建社會末期的明季社會，還是帶有批判正統和啓發自覺的意義。」

應當說明，張岱雖然已經打出陸王心學旗號，但有時也偶而主張調和陸朱，意圖異中求同，合二而一。他說：「世爲陸象山者，則曰我尊德性，爲朱晦庵者，則曰我道問學。昔有兄弟兩分其遺產，諸几桌椅之屬，悉中裂而半破之，雖曰無不均之嘆，兩不適於用矣，豈不惜哉！」（《四書遇》《中庸·大哉章》）這裏張岱似乎又採取了不偏不倚的態度。然而貫串全書的還是和陸王相同的觀點和方法論，甚而至於發爲情不自禁的贊嘆。如「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遂有卓爾之見，全重『我』字。此但云博學以文，約之以禮，則僅可以弗畔而已。此陸象山入微之見，程朱皆不及。」（《四書遇》《論語·雍也·吾憂章》）。

明中葉以後，力圖復興陸象山心學，用以取代程朱理學者，不乏其人，除王陽明外，還有他的弟子王畿、王艮等，他們一方面看到了作爲封建社會正宗思想的程朱理學已日趨腐朽，因而表示不滿，一方面又急不暇擇地從傳統中尋求出路，力圖從道德上政治上挽救明朝社會危機。歷史證明他們的努力不會有多大積極效果，但在客觀上有利於打破封建思想長期桎梏的沉悶局面。張岱崇拜心學，顯然是這

一哲學思潮影響下的產物。他「宗陸而有悖於朱」，這是經學著作《四書遇》反映出來的張岱的基本觀點。從《四書遇》我們還可以知道，張岱常吸取佛學禪宗和道學中所謂微言大義或論證方法，來解釋天命心性等儒學基本觀點。尊儒佛合一論，以禪理陶冶儒經。例如其對《論語·子罕·緇袍章》的解釋是：「此即佛家破執之說。蓋執則非獨未得者不得進，即已得者亦塊磊不化之物矣。」對《孟子·盡心下·寡章》的解釋是：「養心在盡心下一等工夫，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釋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即此寡欲養心之旨。」又引劉元城語曰：「孔子佛氏之言相爲表裏，孔子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意若出一人。」《四書遇》《論語·子罕·絕四章》。

當然，張岱《四書遇》還稱不上陽儒陰釋，但明季儒道釋釋雜的風氣他是有所樂染，而且津津樂道的。如他以佛典《涅槃經》「衆盲摸象」的故事，來說明孟子性善說、荀子性惡說、告子性無善惡諸說的片面和不合理性。《四書遇》《孟子·告子上·性善章》以釋家言「心地平則盡世界一切皆平」，來解釋孔子語「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四書遇》《論語·述而·坦蕩章》以參禪絕處逢生法，來論證《論語雍也·從井章》。《四書遇》《論語·雍也·從井章》甚至概括說：「孔子是佛，子貢是菩薩。佛惟清淨無爲，而菩薩則神通廣大。」《四書遇》《論語·子張·宮牆章》這些解釋未必符合「四書」的原意，但張岱以散文家大手筆，把儒家經典語、諸子百家語和禪宗機鋒語陶冶在一起，說得娓娓動聽，文采斐然，這是枯燥乏味的高頭講章和酸腐味極重的理學著作所不能比擬的。

《四書遇》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談孟子的。張岱基本上肯定孟子。像孟子「失其本心」說，「求其放心說，『攻其邪心』說，即「誅心」說等，張岱就不止一次地加以引伸，掘井及泉，發爲贊嘆。但當孔孟立說彼此有異，或相抵觸時，張岱則大胆訂正以尊孔，決不象程朱那樣曲爲之辯，自圓其尊孟之說。例如：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矯強，可俱謂之真心邪！」（《四書遇》）孟子告子上。性善章》這裏，批評了孟子的性善論。

「三說紛紛，一傍着『性相近』立說，一傍着『習相遠也』立說，一傍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立說。故引孔子作斷案，三說不攻自破。」（《四書遇》）孟子告子上。性善章》

這裏，不僅批評了孟子性善說，甚至連荀子性惡說，告子人性無善惡說，也都受到了批評。

孟軻在封建儒學的所謂道統中，被捧上很高的地位。所謂儒學道統由堯授與舜，舜授與禹，禹傳與湯，湯傳與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與孔、孟，這樣，孟軻便成爲道統傳授中最後一位大師。成了僅次於「至聖」孔丘的「亞聖」。張岱對這種看法并不以爲然。他在讀了《孟子·盡心下·道統章》後寫道：「此孟子一片憂危惕厲之心，蓋既以私淑，而又恐其不得與斯文道統幾絕也。作自任看者，吾不謂然。」張岱的意思是，孟子自稱「私淑」，所以并非道統嫡傳。況且，這裏明確反對道統「自任」說，還有批判程朱在儒學道統傳授中自我獨尊的意思。因爲朱熹《孟子集註》在此章即孟子全書的終了有這麼一段話：

「有宋元豐八年（一〇八五），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

朱熹的意思是二程在孟軻死後千四百年，繼承了儒家的道統，而他自己又是程頤的四傳弟子，得以繼承二程之道統，是當然的儒學道統嫡傳。這種儒學道統新論的觀點，是張岱所不會同意的。因此，確切地說張岱的反道統論，主要不是反對韓愈發明的孟軻傳宗論，而是反對朱熹發明的儒學道統新模